

圆明园的道德故事

梁文道

大英博物馆是一种说文明的方式。它要说故事是从大门左手边开始的,那里有埃及、巴比伦、希腊以及罗马展区,它们是西方文明的根源。大门的右方,则有美国等“新世界”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晚近阶段。至于中国,则与其他亚洲展区并存于大门遥遥相对的另一端,是西方文明的他者,用以比对它自身的独特轨迹和性质。同时,它又是一座帝国的记忆。那些填充它叙事框架的木乃伊、大理石以及林林总总的珍稀文物,恰足以说明大英帝国昔日的强盛、诡诈和霸道。

相对于此,雅典的卫城遗址所要告诉我们的,则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本是西方古典世界的光荣,两千多年以来屡遭天灾、兵燹和劫掠,如今成了一尊碎裂的古瓶,以残缺的片断诱发游人思考那已不复在的全体,和其间蕴涵的意义。

不过,尽管周边有许多招揽游客的小贩,但是整座废墟仍然不失历史的庄严,没有过度恶俗的装点,不曾沦为任人蹂躏的乐园。每一个去过巴特农神殿的游客都会忍不住想象,要是大英博物馆里头的石雕全都运回此处,放在它们原来该有的位置上,那将会是何等壮丽的景观呢?

至今为止,希腊当局已

经成功向瑞典、梵蒂冈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取回了不少卫城遗物。只有英国,仍在舆论的巨压下,力图保留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也还是有进展的。最起码,英方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实在站不住脚,只能用租借或其他合作方式争取最大的利益。

在这样的脉络下,看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或能写出不同的方向。

首先,经过重重转手,现在那几具兽首的物主并非国家,而是私人,争讨工作因此分外困难。从中国民间的情绪看来,大家对圆明园的象征意义的确是很有在乎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假定在兽首无法顺利回归的前提下,中国自己应该先做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升级圆明园的管理权,把它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辖下的圆明园管理处变成国家级的遗址公园管理局,不要再让人进去拍完电影留下被破坏的植被(这正是当年《无极》剧组的作用),还要拆除后来兴建的饭馆和商店(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曹丽娟的调查,此类建筑竟然占了畅春园15%的景点),还它应有的尊严。然后,我们用它去说一段故事。

这段故事自然与国家有关。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

指出,现代中国人之所以不能忘怀一座皇家园林的命运,是因为他们非常困惑,“为何西方人会犯自己订立的国际法,该法明确禁止在战时从平民或国家元首手中,掠夺可以带走的私人财产”,尤其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那一回,因为列强刚刚才在1899年加入了禁止战时掠夺的“海牙公约”。可是,它的意义又不是应该仅限于此。因为圆明园的沦落破败,除了西方,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责任。英法联军撤离没多久,附近居民就跑去洗劫木材了。满清覆灭以后,从军阀到民国政府,从高官权贵到民间盗匪,更是对仅存的遗迹上下其手,巧取豪夺。新中国建立了,遗址毁灭的过程也并没有因此停止;山平湖填,原有的人造丘地成了大片农地与交错的通路。再来则是“文革”,砍去了更多树木,增添了不少工厂……

因此,这个故事是复杂的,但它的主旨却可以很简单;那就是尊重历史,珍视我们手中一切宝贵的物质记忆。任何遗址公园或灾难纪念馆都有建立“道德社群”的效果。它的目的不应狭隘,它的指涉可以广泛。例如西方各地的“犹太浩劫纪念馆”,它们的设立不仅仅在于让犹太人勿忘血恨、凝塑出内向的团结意识,还

在于让非犹太人(包括德国人)深刻自省,了解到走向深渊的道路是怎么搭成的。也就是说,遗址与博物馆所建立的道德社群,它不只对自己人说话,也要对外人说话;它不只要外人反思,也要求自己人奋进;因为道德原则并不止于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今天的圆明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了教育国人爱国,它能不能让西方游客省思帝国主义的残暴?它展示了外敌造成的伤痕;但它有没有提醒我们,就在今天,就在我们周遭,仍有无数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贵的建筑倒在推土机下呢?假如中国人自己不显示出来阻止物质记忆毁坏的决心,又如何能像希腊那样在国际舆论上站稳道德高地,赢取广泛的同情呢?

比起兽首,中国更该取回,也更容易通过外交途径取回的圆明园遗物,其实是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法国枫丹白露的文物图《四库全书》残本。假如真有这么一天,政府预备开口要求,我们就需要更稳固的基础去形成声势。而那个基础,就在圆明园,和它代表的道德权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先问自己:你尊重历史吗?

摘自《南方周末》

去年7月份,我到埃及公干。在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时,我发现埃及有不少“半拉子”建筑。

以开罗为例,这里的“半拉子”建筑多为三至四层高的小楼,混杂在众多的清真寺和民宅中,主要街道两侧也时能看到。

这些建筑的框架都已完成,但全都没有封

是否在我国的银河系的某处存在着一个地球的双胞胎兄弟?

天文学家正在越来越接近于发现一个运行在类地轨道的地球尺寸行星。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开普勒飞行器刚刚被发射去发现这样的行星。

一旦这项搜索成功,那么下一个很有推动性的问题将会是:那个行星可以居住吗?它有像地球一样的大气层吗?

回答这些问题并不怎么容易。

借助于巨大的反射镜面,定位于外层空间并且将于2013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将最有可能帮助天文学家首次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哈佛大学史密斯天体物理中心的研究员丽莎·凯特尼格和韦斯利·特劳布研究在在一次凌日过程中,利用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绘制假想中的类地行星大气层的可能性。

他们发现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将有可能在最临近的地球尺寸行星上发现到某些生物标志物——例如臭氧和甲烷。

“我们得非常幸运才能在一次凌日过程中辨认出类地行星的大气层,这样我们才能说那个行星是类地的。”凯特尼格说,“我们需要把许多次凌日的结果加起来——上百次的结果——甚至是那些20光年远的恒星系统里的凌日过

政策逼出烂尾楼

让我惊奇的是,这些建筑的一层和二层都已经住上了人。明显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无钱续建的烂尾楼。

我百思不得其解,就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一位埃及朋友。

不管是用累加上百次的凌日行技术,还是通过屏蔽来自恒星的光而直接分析行星自身发光的直接影像技术,被天文学家称为“淡蓝色小点”的海洋,都将是下一步目标。

寻找地球的双胞胎兄弟

“即使这很困难,但是为描绘遥远行星的大气层而付出的努力,仍然非常激动人心。”凯特尼格补充道。

凌日过程是指,一个遥远的太阳系外行星在地球的视野里从它的恒星面前经过的过程。当行星凌日时,它的大气层吸收一小部分恒星的光,并留下可以识别每一种气体的特征“指纹”。通过把空间望远镜收集到恒星的光分解成彩虹或者波谱,天文学家就能够寻找到那些特征“指纹”。

这项凌日技术非常具有挑战性。如果把地球看做只有篮球大小,那么大气层将会只有一片纸那么薄,所以最终接受到的信号是非常微弱的。而且这个方法只在行星经过恒星面前的时候才可行,而且每次凌日的过程持续不过几个小时。

凯特尼格和特劳布开始的时候考虑了最理想的情况,即一个地球尺寸的行星围绕一个太阳尺寸的恒星。要在每次凌日过程中得到可以探测到的信号强度,被探测的恒星和行星就必须距离地球尽可能

的近。唯一的一个足够近的类型太阳恒星是人马座阿尔法星A。但是这样的行星至今还未被发现,不过技术使这样的探测在现在变得可能。

他们的研究还考虑了围绕红矮星的行星。红矮星又被称做M型恒星,是银河系中最丰富的恒星,比太阳这样G型行星要普遍得多。而且它们也比太阳更冷、更暗而且更小,这些都使发现一个绕行星M型恒星的类地行星要更容易些。

如果能在类地行星上发现人类,那么就能说明它是人类可以居住的。不过一个类地行星必须围绕红矮星最近才能有足够高的温度得到液态的水。因此,行星会绕行更快并且每一次凌日只持续几分钟到几个小时。但是相应的,也会在一定的时间里经历更多的凌日过程。天文学家可以通过累加几次凌日得到的信号,来提高探测大气层的机会,更频繁凌日使得红矮星成为具有吸引力的探测目标。

一个围绕类太阳恒星的类地行星将会每年经历10小时的凌日,累计100小时的绕行就需要10年的时间。

那位朋友笑了,他告诉我,埃及的房产税较重,按照当地规定,建筑一旦封顶,就视为完工,就要开始交税。于是,有的埃及人为了避税,就采取了这样一种“独特”的建筑方式。只要房子不封顶,税务部门就无法征税,房子的主人就在这种“半拉子”建筑里面住下去。

摘自《北京青年报》

相反,一个类地行星围绕一个中等大小的红矮星将会经历每10天1个小时的凌日,积累100小时的绕行将不超过3年。

“临近的红矮星提供了最好的探测生物标记的可能。”凯特尼格说。

“最终,研究来自行星本身的光子的直接影像技术,将会被证明是比凌日技术更有力的描绘类地行星大气层的方法。”

通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斯必泽空间望远镜和哈勃空间望远镜,天文学家已经研究了太阳系外的极热气体巨行星。不管是用累加上百次的凌日行技术,还是通过屏蔽来自恒星的光而直接分析行星自身发光的直接影像技术,被天文学家称为“淡蓝色小点”的海洋,都将是下一步目标。

天文学家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阿尔法人马座A可能有一个还未发现的绕行的类地行星。那么天文学家就会需要一大堆凌日结果来辨认那个行星的大气层,并有可能找出第一个地球的双胞胎兄弟。

摘自美国《每日科学》网站 王冰编译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978年5月,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在上海联合招生。我脚蹬一双塑料凉鞋,手提一只尼龙网兜,怀揣几枚茶叶蛋,肩扛一架手风琴,从家乡泰兴到上海赶考。我在一个亲戚家安顿好,就随着滚滚人流参加考试。

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复试榜贴出来了,我去看榜,但看来去,就是看不见我那后来变得很性感的“徐小平”的名字!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复试名单榜却要过好几天才公布。我虽然有一种不到黄河心不死姿态,但老待在上海干等也不是个事儿,所以我决定先回泰兴老家去等。走之前,我告诉亲戚说:“到了发榜日,请带我到上海音乐学院去看榜,如果有我的名字,赶紧给我拍个电报通知我。”

嘱咐了我的亲戚。我总感觉还到不够放心。但我在上海就这么一位亲戚熟人,还能拜托谁?想来想去,我想到了在考场上刚刚认识两天的一个考友——王次昭。

我和次昭在考场相识,谈得很投机。从他看我的眼神中我知道,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于是,就在匆匆离开上海的时刻,我把自己最后一线希望委托给他,请他如果看到我的名字,给我发个电报。我是多么强烈希望自己能够获得复试以及录取啊!所以,这个对次昭兄的委托,凝聚着我对自己命运最深沉的期

好些中国内地的名人,申请“优才计划”,成功当上香港人,如郎朗、李云迪、胡军等。

近日,狗仔队发现影帝葛优在香港出现,还到澳门赌场耍乐,小注怡情。葛是否“优才计划”者不太清楚,他本身就是“优”。

——不过某天看到内地电视台访问一位北影老演员葛存壮。他长得高大威猛,年轻时尽在电影中演地主汉奸和日本鬼子,总之是大反派、大坏蛋。人们唤“老嘎”。看上去,才知道他是

考友的托付

徐小平

盼。

比我年长七岁的次昭兄,毫无疑问肯定比我更希望获得复试。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那次公布只在全国范围内招10个名额。考生之间竞争之惨烈不言而喻。我和次昭既是考友,其实也是竞争者。但我好像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只是怀着对次昭完全的信赖,离开了上海。

复试发榜那天是我的生日。早晨起来,我就开始等电报,等待命运的宣判。但等到中午,电报还没有来。我甚至走到了邮电局里面去等,以防邮递员送错地方。但等到下午将近两点时,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全家人相对坐着。大概在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门外响起了命运的幸运敲门声:“电报!电报!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复试通知终于到达了!”随着街坊邻居纷纷嚷嚷起来,爸爸妈妈和我的眼睛立即亮了。

当时泰兴到上海已经没有班车,唯一能让我第二天早晨赶到上海参加8点多公里的长江边上。我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江对面的渡轮,在那里买了一张五等舱的船票,登上了即将起航的客轮。

五等舱的乘客,全是带着自己的鸡鸭鱼蟹猪去上

海赶早市的江北农民。舱内除了听不到人的音乐,什么动物的摇滚都有。而我,美滋滋地与那些即将被上海人民吃掉的鸡鸭鱼虾一起,脚沾着鸡毛,头枕着波涛,面露着微笑,向着大海,向着我的未来航行!

那天深夜,就在我和各种动物酣眠在一起的时候,另外一份通知我面试的电报到了泰兴家里!

家里人接到这份作为喜讯的电报,却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我只委托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恰恰是发送这份深夜来电的,我的前途可就毁了!因为复试就在第二天早晨8点举行,除非我有直升机,否则只好望洋兴叹,遗憾终身了!这要比收不到复试通知还要冤!

幸亏那第一份电报!但庆幸之后,大家又感到纳闷:是谁,选了这么晚的时间把复试通知送给我呢?上海到泰兴的电报从发送到收到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半夜来的电报,发的时候应该已经晚上七八点了。故意这么晚才把消息送给我,这个人显然不会是我的亲戚,肯定是那位受托的考生,故意拖延到晚上才发电报。这样,他也许就可以消除一个竞争对手了。嗟叹人心险恶!并夸奖我好聪明,知道多留一手,让亲戚替我双重保险!

葛优的原名

李碧华

葛优的老爸。

奇怪,葛优长得腼腆,小眼小嘴的,有点女气,身材也瘦削,跟老嘎两个样。

原来葛优像妈妈。妈妈当然清秀优秀,名字唤“文心”,是位电影文学编辑,人如其名,年岁大了,仍一派优雅从容。嫁给银幕上的坏蛋恶男,美女野兽之组合。

葛优的妹妹唤葛佳。

一优一佳,踌躇满志似的。

——不过他原名并非“优”。

父亲好烟酒,沉迷摄影。还一度被批斗,日子过得艰辛,母亲默默支持。1957年,儿子难产,父亲面临人生中最痛苦的抉择。医生道:“得有心理准备,两个只能保一个,要大人?还是要小孩?”

父亲考虑后,决定要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家的推测都错了。恰恰是王次昭——这位当时我还素昧平生,只是在激烈竞争的考场上萍水相逢的考友,看到复试榜上我的名字之后,花了宝贵的钱,花了宝贵的时间,怀着纯真的心灵,在第一时间给我送来了复试的喜讯。那天,我的亲戚却没想去看名单,因为他觉得我根本没戏。到了傍晚时分,他信步走到了离家不远的音院发榜处,在那里居然看到了我的名字,于是立即给我发来电报,虽然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钟了!

我心里充满对次昭的无限感激。如果不是这位我素昧平生,才认识两天的杭州考生第一时间先给我把电报拍过来,我的大学梦,一定会就梦断扬子江了。

我说不清楚,次昭后来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和他当年给我发电报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好人有好报!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为和自己毫无关系,甚至还有利益冲突的陌生人做好事。次昭这个拯救了我梦想和前途的电报,显然堪称纯真年代里纯真人情的经典风范。

那份电报原件,已经不复存在,否则,我会把它捐给中央音乐学院,摆在校长馆里,告诉学生:想当院长吗?看看王次昭是怎么帮助徐小平的!

摘自《仙人指路》

大人。他紧张地等待在产房外。当时门开了一道缝,刚好见着她。她不知危难生死关头,还向他微微一笑……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四斤,得住暖箱,能否存活看天意。父亲给他改名:“葛优”。因为他实在担忧。只希望和睦安详,健康幸福。

当然,儿子后来成了大腕,便“优”而不“忧”了。

摘自《时文博览》

总之,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对此有些感悟,我讲出来与大家分享。

我的五字人生感悟

乐黛云

己有什么了不起。

第三个字是“德”,就是道德的“德”,道德是任何时候都要“修”的,孔子讲的“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如果不讲“德”,不讲“学”的话,那是非常大的忧患了。无论在什么意义上,我总觉得自己要做个好人,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像费孝通先生讲的,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一般普通的老百姓也不一定就望子成龙,可是他希望孩子是个好人,不要是个坏人,这是生存在我们老百姓文化中的一个基因。在我最困难、最委屈、最想不通的时候,我觉得有两句话是我生活的支柱,那就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虽然任何权利都被剥夺了,但我还可以做一个好人。我在乡下做监督劳动时,正是大饥馑的年代,领导要求我创造一个奇迹,要把四只小猪,在不喂粮食的条件下,也能养肥了给大家过年。就这个任务,当时我很着急呀,每天漫山遍野让猪在地里拱食,到处给它们打猪草。后来把那猪养得还可以,反正不算肥,但是大家过年的时候吃得挺高兴,我觉得也很好。所以不管怎么样,就算在很困难的环境里,还是要独善其身,竭尽全力,做个好人,所以老乡都很喜欢我。当时我住的那一家,老大爷是个放羊的,他去放羊的时候,捡到一个核桃、半颗花生什么的都带回来给我吃。那时候的下放干部都得了浮肿,因为粮食不够,可是我没有浮肿,那就是因为我常常可以吃捡到的核桃、花生、白薯头,而且我

们那个大娘养鸡,除了上交的鸡蛋定额外,总还能剩下几个。我们三个人,几乎每隔几个月就会有一次“鸡蛋宴”,三个人吃8个鸡蛋!所以我一直没有浮肿,身体很好。如果那时候看不见前途就完全消沉,什么也不想干了,或者说你对老百姓很冷漠,对大家很抗拒,如果没有“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就会觉得日子没法过去。

第四个字是“知”,知识的“知”。“知”是你自己求的,就是说你要有知识,要有智慧。这一点,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没有放弃。即使在放猪的时候,我也一边放猪,一边念英文单词什么的,没有把英语基础全丢掉。我原来是喜欢外国文学的,特别是屠格涅夫等俄国小说,他写的革命女性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另外一方面,我也很喜欢中国的古诗词。我很喜欢,一方面我欣赏那种特别进取的,像我喜欢的俄罗斯文学都是如此,立志要为别人、为大众做一件事;可另一方面,中国的诗词,特别是元曲里那些比较消极的东西对我影响也很大。比方说老背的那些元曲:“朝如青丝暮成雪”,“上床和鞋履相别”,“人生有限杯,几个登高节”之类。这些“知识”对我以后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是很重要的,因为我知道一点西方,又知道一点中国,然后又运气好,到了哈佛大学,接触了比较文学科,这就使我有从事比较文学的愿望,特别喜欢这个学科,也看到这个学科将来的发展未可限量。所以这个“知”对人很重要,有时也会决定人的一生。如果你没有这个知识领域,没有看过相关的

名流故事

书,你根本不接触,那就不可能向这方面发展,你这个就会很闭塞,可供你选择的道路也会很少。所以,我很看重这个“知”字。

第五个字是“行”,上面谈到的一切,最后要落实到你的行为。这个“行”其实是一种选择,就是当你面临一个关口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人所面临的选择往往是纷繁杂的,也有很多偶然性。即便前面四个字你都做得很好,可是这最后一步,当你跨出去的时候,你走岔了,走到另一条路上去了,或者你这一步走慢了,或者你走快了,你照样还是不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我觉得我自己有很多这样的关口,例如那时到苏联去开会,领导真的挽留我,告诉我你可以到莫斯科大学留学,兼做国外学生工作,但是我还是决定回北大。后来季羨林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写序的时候,他说,乐黛云这个选择是对的,也可能中国掉了一个女性外交官,但中国有了一个很有才华的比较文学开拓者。这就是说选择很重要,人的一生,有时选择对了,有时选择错了!选择对了,运气不好也不行。记得我大学毕业时,彭真市长调我去做秘书,我选择不去,但也由不得我!没想到一来二去,当时竟把我的档案弄丢了,我也不想去找,后来也就算了。这样,我还留在北大,这就是选择和命运的结合。

总之,命、运、德、知、行,这五个字支配了我的一生。对此有些感悟,我讲出来与大家分享。

摘自《读者》